

广州城事 | 现象 |

禁收“赞助费”后又冒出“一次性设施使用费”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骆莘 实习生 曹佳黎

民办养老院收费是非多多

多声道

市内多家民办养老院称 一次性设施使用费不能退

近日,本报报料热线接到市民孙先生来电,他投诉广州吴琛养老院收取12000元赞助费,老人入住后,觉得服务和入住条件没有宣传的好,但养老院称已签协议,不能退钱。

吴琛养老院根据房间不同,收取的一次性设施使用费由6800-30000元不等。记者暗访时,接待记者的养老院主任林先生表示:“一次性设施使用费是使用养老院设施所交的费用,是根据市场情况定价的,属于行业内定价。”费用的高低根据养老院的环境、设施情况来看,不同的养老院条件不一样,费用多少也不同,“其他的养老院,收一次性设施使用费和我们差不多,但是是分阶段的,五年和十年以后都要分别加钱,我们的价格是比较公道的”。他默认“赞助费”这一称呼,也承认这不是民政部门规定的收费。

林主任称,一次性设施使用费是“一次性交清的”、“终身的”,不管老人住多久,或者合同到期不再住,“不论什么情况,都不能够退”,这会在所签合同中写明,“我们开具发票”。

记者随机向市内几家民办养老院了解情况,对方都避谈赞助费,但同时称收取一次性设施使用费在所难免。越秀区德政南街的广州市东山区福利院(怡康苑),广州大道1690号的海珠区社会福利院,均要收取一次性设施使用费。白云区大和镇永兴村陈太路339号广州市高乐托养院,刚开始说不需要交赞助费,后来又又说还是要交设施使用费,1500-2000元不等,是棉被、床上用品等设施的使用费,“价格是自己订的”。

记者在随机采访中发现,只有荔湾区幸福养老院不收取赞助费。

记者暗访

寿星大厦的推销手法有玄机

只找老人 专防后生

寿星大厦可谓广州众多民办养老院中的“明星”,经过10年的经营,其资源优势相对突出。在众多老人院视交“赞助费”为惯例时,寿星大厦打出了“免交赞助费”的口号,推出“休闲养生卡”的服务。

记者近日伪装客户,前往一探究竟。

凭券优惠吸引老人 反复推销“好处”多多

若想“免交赞助费”,必须先拿到寿星大厦派发的参观券。据了解,参观券由寿星大厦的推销员在广州各大公园向老人派发,券上盖有红字:免交赞助费。有推销员对记者说,凭券才能参观及得到优惠。这种凭券优惠的宣传,吸引了不少老人。

写在前面

有读者爆料,入住老人院要一次性交纳一笔费用。记者随机了解情况时,市内几家民办养老院都避谈“赞助费”,称收取“一次性设施使用费”在所难免。无论叫“赞助费”,还是叫“一次性设施使用费”,这笔费用成为经营民办养老机构一个有争议的话题……



老人的生命通道是最后越艰难 宋金岭 摄(资料图片)

观察手记

民办养老院 赚钱宜适度

养老院收取一次性购置费,可谓行业内默认的“潜规则”。

记者在暗访时发现,寿星大厦的推销员向老人推销“休闲养生卡”时,很强调“机不可失,时不再来”。推销员看似为老人着想,嘘寒问暖,亲自接送,但其目的无非是赚取提成。据业内人士透露,推销员每卖出一张“休闲养生卡”,可提成30%。即卖出一张1万元的卡,可以得3000元;卖出48000元的卡,提成高达14400元。

按照广州市民政局有关负责人表示,一次性购置费指的是一次性收取相关的设备费,如床位数、建设费等,收费合理。既然如此,这项费用应该开诚布公地向老人说明,为何寿星大厦却将老人院的床位当成可炒卖的房子一样推销?

养老机构进行政府购买服务后,鼓励民办,虽然自负盈亏,但仍是社会福利机构,应该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,不能像纯商业那样挣钱。

15年。“休闲养生卡”只出1万张,分10期推出,现在是在第3期,期数越往后,价格越贵,上一期售完才到下一期,卡售完时,寿星大厦床位也就没有了。

“跟买房子一样,可以转让给别人。现在养老机构的床位需求那么旺,只会涨不会跌。”业务员说,购买了休闲养生卡,等于预定了寿星大厦的一个床位,如需入住只要提前15天通知,大厦会马上置办全新的家具设施和床上用品。

虽然合同写明“休闲养生卡”不能退还,变更需要在卡的有效期限内,毁约要交20%的违约金,但业务员却向在场的老人承诺,如果老人入住后不满,将由他们负责将卡转让出去,“市场需求很大,床位费只有上涨的可能,怎会转让不出去?”

推销员说,老人如果购买B卡和金卡,还可以享受每月200元或250元的福利补贴,“当然,补贴要满足一定特殊条件才能申请,比如残疾人、国家

干部、教师等”。业务员得知记者的老人家属不符合以上条件后,压低声音说:“如果你购买金卡,我可以和领导商量,通融一下。按每月补贴250元计算,15年共补贴45000元。现在购买金卡需要48000元,相当于入住15年只花了30000元……”

每位老人被“全陪” 年轻人上门遭防范

在现场,每一位老人都由业务员陪着,和其他老人相对分开。到了单独商谈合同时,业务员“叔叔”、“阿姨”喊得很甜。

李阿姨表示对交卡费的担心:“哪天不想住了,想换地方,怎么办?这钱就不能退啦?”业务员说:“我们这里绝对是广州设施和服务最好,很多老人都从别的养老院转过来的。现在入住4000多人,都愿意长住。”“我们在海南、青岛等地都有连锁机构,老人不

住,你们也可以住啊。”“我们住?”李阿姨很惊讶。“对,你们不是住养老院,是去海南度假,住我们的连锁机构。一卡多人可用,时间、地点灵活可选,是不是划算?交赞助费不能换房间。现在在这住满一个月,可以试其他房型!”不过,业务员表示不办卡不允许试住。

据业务员称,一般每天参观结束后直接签合同有七八人,“如果没那么多现金,可以先付订金,但是当天下午要去东峻广场签合同”。记者乘车返回东峻广场时,车上的老人少了三分之一,同车返回的大部分老人表示要“再商量”。

记者暗访期间,推销员的警觉性非常高,“真的是有老人要过来吗?”这句话问了数次。推销员给记者乘车卡时表示:“要是平时,看到你这样的年轻人,我是不会那么轻易把乘车证给你的,我们一般都是让老人去看。”

市民政局负责人表示 禁止收取赞助费 允许收取一次性购置费

赞助费是否等同于一次性购置费?民办养老机构为何要收取这笔费用?

记者就此采访广州市民政局有关负责人。有关负责人表示,按照民政部门对民办养老机构的有关规定,不准收取赞助费,但可以收取一次性购置费。

一次性购置费指的是一次性收取相关的设备费,如床位数、建设费等。有些机构每月才收700元的入住费,根本不够支出,所以许多民办养老机构收取一次性购置费,以支付经营中出现的高额费用。有关负责人说,这种方式能减少每月缴纳的入住费用。

一次性购置费按规定不能退,但这笔费用不是强制性收取,入住老人可以选择交这笔费用。如果不交,这笔费用则分摊在每个月的入住费中,每个月的入住费将相对提高。

老人入住养老机构时,可以选择“入住适应期”。一般来讲,适应期可以长达3个月,老人入住满意后才交费。民政部门一般要求民办养老机构向入住老人提供“入住适应期”。

目前,民办养老机构的价格已放开,物价局对此价格放宽,民政部门只对服务,如人员配备、服务标准、护理条件等进行监督。有关负责人称,民办养老机构与入住老人签订的入住协议具有法律效力,“双方经协商后签订协议,是你情我愿的,监管部门不便干预。但如果接到有关一次性购置费方面的投诉,将会与院方进行协调。院方愿意,则可以作出相应减免;若院方不同意,我们也没办法”。

民政部门建议,老人入住养老机构时最好先使用“入住适应期”,再考虑签约,勿贸然签约,以避免不必要的纠纷。

广州城事 | 慢读 |

天文数字 出现街头当暗号

相继出现于环市东路、农林下路的一串串奇怪数字原来是“路面定位系统”,不过有人担心是新型“牛皮癣”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黄宙辉 实习生 曹佳黎 赵阳阳

细心的市民发现,环市东路广东工大附近的南面人行道,出现一系列奇怪的数字“阵”。“2220 环市东路HSD510075”、“2240 环市东路HSD510075”……这些数字一直延伸到动物园南面的天桥下,好似电影里的神秘代码,引得不少路人驻足。

“这些数字代表什么?”路人纷纷猜测,“应该是市政修路时的标记”,“我猜是网络或电力部门的编号”,“就是测量路长的呗”……但数字的间隔为何不相等?

在附近工作的清洁工也发表看法:“它们会不会与门牌号有关?你看每一组数字都对着一户人家或商铺。可再看门牌:7号、9号……这两者又怎么联系起来呢?”

路过的“的哥”也来猜:“不会是今年亚运会马拉松比赛的里程标志吧?我在农林下路的人行道上也发现类似这样的数字。”

记者几经周折,终于打探到可靠结果。原来,这是广州民间发明爱好者周良勇琢磨出来的“路面GPS数字定位系统”:以道路的一端作为起点并定为0米,然后每隔4-30米不等,在路边商店、单位、住户、路口等需要的地方标注里程数字,以及路名缩写和邮政编码。比如:“2220 环市东路 HSD 510075”表示这里距起点有2220米,HSD为“环市东路”的缩写,“510075”就是邮政编码。

周良勇说,如果将一条路当成一把标尺,然后标上刻度,这样就不能随时知道行人、车辆、建筑物在路上的准确位置吗?据悉,这项发明已得到发明专利。



周良勇与他的“路面定位数字” 宋金岭 摄

对话当事人

广州发明人周良勇发明的“路面定位系统”(也称“路面版GPS”)已在广州进入试点阶段。这个被周良勇称为“门牌号码的终结者、亿万出行者的引路人、普罗大众的GPS”的定位系统,是如何“现世”的?

昨天,羊城晚报记者与周良勇进行了一番对话——

初衷 解决找路之痛苦

羊城晚报:当初是如何想出这个发明的?
周良勇:在广州生活,常会遇到找路的难题。因为广州的门牌比较混乱,有重号的,有漏号的,有自制门牌的,有自编门牌的。大约是从2000年开始,我就想,能否发明一个方便的找路系统?美国有卫星GPS定位,能否把它移植到高楼,再到地面上?当时想了几十个方案。

一个很偶然的机会,我手中拿的标尺找到了灵感。标尺上不是有刻度吗?每个人都会明白10厘米是在什么位置。如果将一条路当成一把标尺,然后标上刻度,这样就不能随时知道行人、车辆、建筑物在路上的准确位置吗?后来,我把它命名为“路面定位系统”。

羊城晚报:“系统”如何定位?
周良勇:在路面上每隔5-40米距离标注一个里程数字,所标注的里程数字是该处与该路起点之间的里程值(或路程值),这样,一条路就像一把巨大的尺子,人和物在路上哪个位置就可以准确定位了。

另外,在标注里程数字的同时,还标注该地的邮政编码,这样从邮政编码中就可以知道这里是中国的什么地方了。

路面定位系统中的路面地址有两种表述方法:通俗法和通用法。比如说,环市东路2608米,可用通俗法表示为“环市东路2608米”,也可用通用法表示为“2608.HSD.510075.cn”。

【记者去采访周良勇时,便是通过他的“路面定位系统”,一下子就在环市东路准确“定位”到他的办公地点。他告诉记者,他办公所在的东都大世界,前后有560米长,但都共用一个门牌号475号。如果只根据门牌号,要找到他的办公室,还得颇费周折。】

羊城晚报:这个发明有没有申请专利?
周良勇:我在2005年就开始申请,去年7月拿

到了专利证书。

前景 去哪都不用问路

羊城晚报:目前哪些路段有这个路面GPS?
周良勇:二沙岛的晴波路、中山大道西、农林下路和环市东路都已作了试点。我计划把整个环市路都做完,做成一个示范路。另外,在我的老家海南琼海,也有试点。

羊城晚报:打算如何推广?有没有联系政府部门?
周良勇:我先用两条样板路做示范,让市民接受了,觉得它好用再作打算。另外,通过派发传单等方法推广之。老实说,目前还没联系有关部门。省委书记汪洋说过,我们不能只说多做或少说少做。我就先做好了,再让有关部门来看它的实际效果。

羊城晚报:你预计政府部门会同意投资推广这个发明吗?
周良勇:当然会。我先试行,它的作用被市民认可,就有说服力了。市民都觉得好,政府肯定愿意投资,我相信只要人们都了解它的用处就能推广。我希望路面定位系统不久就能在城中的多条道路上应用。到亚运会举办时,无论是广州市民、国内游客,还是外国友人,谁都能知道自己所在广州的准确位置。

羊城晚报:这个发明花费了多少?有经济收益吗?
周良勇:差不多五六万元吧。至于经济收益,有使用的专利费,政府部门在城市推广使用后,可向市民征收一定的使用费,比如每人每年1元。此外,还有广告费等其他收入。

争议 另一种牛皮癣?

羊城晚报:在路上画这些数字,没有人阻拦吗?
周良勇:这不犯法,为什么要阻拦?
羊城晚报:有人认为是“地面牛皮癣”,你怎样看?
周良勇:这种路标整齐,统一地标注在路面上,任何人只要到现场走一走,看一看,“觉得难看”的主观想法就会彻底改变。它有点像路边的垃圾桶,也不好看,但又是必需的。所以,我不认为它是“地面牛皮癣”。

羊城晚报:有人说,这个路面定位系统没用。
周良勇:反对的声音肯定会有。路面定位系统是一项新发明,新事物,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它或不了解它,所以才认为它没用。汽车在刚发明出来时,很多人都说已有马车了,而且马车已经很好用了,还要汽车这个既危险、又要吃油、还要走好路的东西干吗?但最后,汽车不是被推广开了吗?

解读调查数据

调查对象:80后新生代农民工 八成人月入低于两千元 认为“同工不同酬”是最大的不公

本报讯 羊城晚报记者张薇、通讯员史功汇报:与父辈们不同,以80后为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较高,他们更加渴望融入城市和城市里的大学生,白领一样进取奋斗在城市实现梦想。《广州市新生代农民工状况调查汇总》近日出炉,调查显示:广州半数农民工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;超过八成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险等各类保险;制造业仍是广州农民工从事的最主要行业,但已出现向服务业等其他行业分流趋势。但他们的薪水普遍不高,仅有两成人高于2000元/月。尽管如此,他们中的大多数人,未来打算仍是赚足钱回家乡或留在城市自己创业当老板。

进城目的“赚钱+多学”

本次调查在全市范围抽样对1000多名1980年后出生的农村户籍农民工进行了问卷调查。作为第二代农民工,他们中有80%的人是在家乡长大,随后才进入城市打拼,其中近七成人有高中(中技、中专)以上学历。在新一代农民工眼中,进城不光是为了谋生,学技术才是真正的目的,所以他们在找工作时考虑的因素会更多,其中半数农民工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。如今,他们已不得不在最脏、最累的岗位上,新一代农民工的目光已经投向到服务业、制造业、纺织业、电子业等第三产业,他们希望能在大城市买房,像城里人一样生活。

以往外来务工人员背井离乡,主要的“动力”是赚钱过好日子。现在,除了希望自己手头能赚更多的钱外,农民工对于福利保障上的要求,维权意识也是日渐高涨。在调查中,大部分的新生代农民工对劳动权益问题非常重视,超过五成受访者定期看电视、报纸、互联网等媒介了解政府政策信息。55%的人是工会会员,如果在工作生活中遇到困难,有26%的人表示首先向工会组织求助,选择政府部门的有6.5%。

月薪不高抱怨同工不同酬

调查显示,在今年工资普遍上调的情况下,仍有16%的受访者平均工资低于1030元/月;其中月薪1030-1500元的占28.5%;1500-2000元的占34.6%;2000元-3000元的占17%。也就是有八成广州新生代农民工月收入低于2000元。近半数人反映,同工不同酬是其受到的最大的不公待遇,他们认为城市对外来工的各种限制且针对外来工有不合理收费。劳动经济权益,如工资福利等得不到保障。有半数人因为工作不稳定的原因,未参加社保。值得关注的是,调查中有三成人在工作单位压根没有社保。

调查显示,尽管金融危机危机的浪头已经过去,各地再现实“用工荒”,但23%的新生代农民工依然认为,工作机会不多,竞争激烈,压力太大。说到希望,有八成人表示要通过努力赚钱回家乡或留在城市创业当老板。